

# 古籍保护

专刊

藏书报

2017年1月9日

创刊号(总第2期)

本刊主编: 刘晓立  
版式统筹: 常英  
联系电话: 0311-88643113  
投稿邮箱: liuxiaoli0119@163.com

藏书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主办

## 一方阵地，一个平台，一起前行

尽管寒风凛冽，尽管雾霾笼罩，新年的钟声仍给我们的的心灵以莫大的回应，甜蜜又温馨。

回望2007，古籍保护迎来了最明媚的春天；转眼十年，“古保”步履紧凑又扎实：古籍普查，古籍数字化，古籍人才培养，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古籍收藏的广泛性和深入性……一个个脚印，记录下了那么多。从沉睡到活起来，这十年，让古籍焕发新生。馆藏 in 书库的，散落在少数民族的，以及遗存在寺庙、道观的，包括民间收藏的一批批珍品，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一部部濒危古籍，得到越来越科学的保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工作者，从年长者到年幼者，都在向着一个方向努力前行。

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古籍保护依旧期待大众的参与。2017年岁首，《古籍保护专刊》在这个充满梦想的时代诞生，我们有感于肩上的重任，致力于记录下古籍保护路上的点点滴滴，让古籍之声传遍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熠熠生辉。《古籍保护专刊》是一方“人间千帐灯”下的阵地，一片经典回潮声中的平台，2017，一起前行。



## 古籍保护将走向「民众自觉的保护」

□ 张志清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之际，《藏书报》总编王雪霞女士决定正式在该报推出“古籍保护专刊”，预计2017年将有一百版面世。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本身就说明古籍保护已经逐步深入人心，成为业界和百姓共同关心的话题，可喜可贺！

回顾新世纪古籍保护的历史，我认为它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工人的保护”、“古籍专家的保护”，到“科学家、古籍专家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的保护”，目前也闪耀着第四个阶段——“民众自觉的保护”的曙光。

十年前，全国图书馆古籍修复人员的最高学历是大专，人员老化，后继乏人。普遍看法认为修复者就是修复工人，自己不懂书，要古籍专家告诉他们修什么，如何修。“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正式实施，标志着党和政府把古籍保护和传承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也说明一批古籍专家学者对古籍保护加以青眼，认真思考和改变古籍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如家底、人才、收藏环境、修复、再生性保护和开发利用等问题。但从当初“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组成看，多数还是从事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的文献家，修复专



家只有一人，科技和计算机专家只有寥寥数人，说明了科技和工艺尚在边缘，也说明当时的古籍保护还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延伸地带。随后几年，古籍保护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上千家古籍收藏单位改善了古籍保护环境；一批本科硕士进入古籍修复领域；超过2000家单位开展古籍普查，一批珍稀孤罕的古籍得以发现和揭示；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就为1700多家单位培养培训了近万名古籍保护人才；古籍影印再造、数字化和推广利用蓬勃发展。特别值得重视的就是先进科技和工艺技术在古籍保护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2014年，以复旦大学成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为标志，一批物理、化学、生物、材料、信息领域的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共同参与古籍保护；中山大学也开展了中西方古籍修复工艺比较研究和西文修复人才培养；南京艺术学院把艺术学与古籍修复结合起来，以提升古籍修复成果的艺术水准。这些都是划时代的进步，也标示着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开始建立。

2015年初，中国古籍保护协会成立。这个行业大家庭的出现凸显社会资金、社会力量参与古籍保护的积极性，也说明民间在古籍鉴定、收藏、保护、传播、利用方面，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藏书报》“古籍保护专刊”就是在这重要时刻应运而生的，闪耀着“民众自觉的保护”这个即将来临时代的曙光。

必须指出，古籍收藏单位的广大古籍工作者永远是文化遗产最坚定的捍卫者。这里面有“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倡导和开拓者周和平先生，有数十年如一日潜心钻研文献的李致忠先生，有刚下手术台就用手机指导学员掌握修复关键技能的赵嘉福先生，有把各学科结合起来打造古籍保护新学科的杨玉良院士，有尼泊尔大地震刚发生就背着氧气瓶到海拔最高的寺庙去普查古籍的尼夏先生，有访碑途中因伤致残仍然坚守藏书文化的韦力先生，有从美国归来致力培养古籍保护人才的沈津先生……这样的人和事迹不胜枚举。他们创造了昔日古籍保护的辉煌，相信有更多的人去创造古籍保护的明天。《藏书报》就是明天的见证。

### 古籍专家智库

**安平秋**  
北京大学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

**黄乔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专家，古籍研究专家。

**李致忠**  
中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李国庆**  
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研究员，古籍研究专家。

**孟宪钧**  
古籍版本鉴定、碑帖版本鉴定专家。

**倪晓建**  
首都图书馆原馆长，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

**沈津**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部原主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古籍版本学家。

**宋平生**  
中国人民大学古籍研究所原所长，古籍版本专家。

**拓晓堂**  
古籍拍卖专家。

**翁连溪**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殿版古籍研究专家。

**韦力**  
当代古籍收藏大家，古籍研究专家，作家。

**辛德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藏书家。

**杨光辉**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索引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周振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周心慧**  
古籍研究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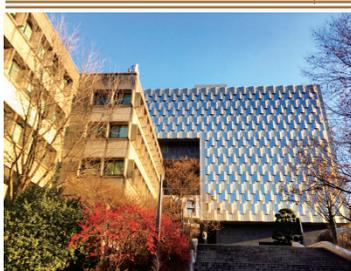
**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

(名单顺序按姓氏音序排列，名单持续增加中。)



2014年，复旦大学成立国内首个“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这是由复旦大学图书馆牵头联合各院系共同组建的学科平台，以促进古籍保护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自2015年首届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专业硕士入学以来，古籍保护研究院十分重视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修复、破损率调查、考察参观等，给学生提供了多种学习实践的机会。

近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组织学生赴韩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教学实践。“希望通过对韩国四大高校及文化遗产研究院、私人藏书家的实际考察，让学生初步了解韩国古籍收藏与保护状况，促进了两国间古籍保护材料与技术的相互了解。”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介绍说。



## 古籍保护韩国考察记

□ 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应超男 杨雪珂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12月，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5级图书情报专业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专业硕士生赴韩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教学实践，先后考察了仁寺洞文化街（古书店“通文馆”等）、韩国成均馆大学图书馆与尊经阁、高丽大学图书馆、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国立博物馆、首尔大学图书馆及奎章阁、延世大学图书馆等，了解了韩国古籍保护与修复、收藏与整理情况。

### 1 仁寺洞满是韩国特色

12日下午，我们到达韩国首尔，短暂休息后，即奔赴仁寺洞。仁寺洞在朝鲜时代（1392-1910）是官府和两班私宅密集的地方，后来没落的两班把家中的物品拿出来卖钱，于是这里就应运而生了一些古董店。渐渐地，仁寺洞古董街又有了展销古董的画廊和相关联的店铺，这里也就发展成买卖文化商品的文化街。漫步在中央大街上，道路两旁可以看到许多画廊、艺术品店，还有不少售卖韩服、陶瓷、旅游纪念品的特色店铺和传统小吃店、茶馆等，琳琅满目，满是韩国特色。在这里，我们还特地考察了华峰古籍收藏与拍卖行，看到了展出的历代高丽活字版本图书。

### 2 成均馆尊经阁 在建人物关系数据库

13日上午，一行人首先来到成均馆大学1398年建立的成均馆古建遗址，17世纪初重建的明伦堂、大成殿和文庙碑均保存完好，其中明伦堂还保留着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金陵朱之蕃题写的匾额。

随后，我们来到了成均馆大学图书馆，这所古老大学以“仁、义、礼、智”为校训，“成均馆”名字来源于“成人材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收藏古籍的尊经阁在2000年始称为东亚学术文化院，十分重视古籍中的族谱研究与户籍资料数据库建设，正在建设的人际联系查询系统，目前已完成十分之一。在现代对古籍善本的衡量标准——“三性”中，极为重要的一性即“学术资料性”，学术因蕴含人的系统思想而称之为学术，成均馆尊经阁利用古籍中的人物关系建立数据库，可谓是古为今用、化藏为用的典范，平衡了古籍的保护与利用。

### 3 高丽大学馆 兼顾“藏与用”的典范

下午，我们访问了高丽大学。首先参观了高丽大学百年纪念馆，馆中展出有刻书木板和出版汉韩字典所用的铅活字等，还有幸调阅了元刊本《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等藏本。

随后，我们参观了馆中的贵重书库（收藏1592年前的文献）。书库采用恒温恒湿环境，所有古籍都采用横放。古籍部具博士向我们介绍了高丽大学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与普本的年代划分、古籍借阅和修复状况等。具博士表示，修复古籍是为了更好地使用，目前修复的古籍至少能保存百年，百年后希望有更好的修复技术，使古籍的寿命再延长。在古籍借阅上，高丽大学图书馆也来者不拒，尽可能满足读者的借阅需求。目前，在尊崇传统

文化思想潮流下，高丽大学图书馆查阅古籍的读者平均每天都有十位左右。

### 4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 用科学的数据助力修复

14日一早，我们出发前往大田市，访问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研究所主要负责韩国文物的分析检测以及修复工作，分为石器保护分析室、木材料分析室、纸本文献修复室等。如果韩国各博物馆等机构有文物修复需求，都会送到研究所修复。在这里，首先会针对送来的文物进行取样检测分析，收集相应的数据后再分门别类送往各个修复室里进行修复。我觉得这是值得借



鉴的地方，其实不仅仅是古籍，任何文物在修复之前，有了科学的数据和理论支撑，再加上修复师的“妙手回春”，才能保证文物得到最好的保护。

在纸质文献修复室里，共有五位修复师。我们注意到，他们用于修复的纸张与书页颜色相差较大。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种纸是专门用于修复的，是一种较薄的皮纸，因为能保存很长的时间，一般都用作补纸。在修复古籍的时候，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选配补纸，选择材质相同，颜色相近而比原书页颜色稍浅，厚度比原书页略薄的补纸为最佳，这样修复出来的古籍整体看来会较美观，达到“修旧如旧”的原则，同时相同的材质也使古籍较易保存。之后还看到了一件从博物馆送来修复的朝鲜时期士兵的衣服，旁边有一位女史在做修复前的记录报告。

### 5 首尔大学奎章阁 展中国失传孤本小说

午饭过后，我们回到首尔市，参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该馆主要展出韩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遗物，藏品约10万件。在这里，我们欣赏了博物馆的古籍、书画以及拓片，其中小字本的《大陀罗尼经》和《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合刻本尤为吸引人。

15日，首尔大学之行从奎章阁开始。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国学研究院收藏了原皇宫及高丽大学的古籍善本。首尔大学1945年前的古籍也都存于奎章阁。阁中正在展览的古籍为高丽历代典籍以及中国已失传的孤本小说《型世言》，另有雍正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等。正在首尔大学访问的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继永教授陪同翻译。

首尔大学中央图书馆现任馆长是建筑系教授，亲自参与新馆设计。新馆2015年建成，新老楼建筑融汇一体，大约各占一半体积。修复室采光极佳，修复工具陈列整齐，修复浆糊浸水一年后放冰箱再取用。馆中另辟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捐书阅览室。

16日一早，我们出发访问延世大学图书馆，中文系的金铉哲先生全程陪同。据介绍，该馆馆藏古籍十余万册，其中中国古籍约一万册。在他们珍贵古籍书库里，我们有幸看到了高丽两宋时期的佛经、明代铜活字印本以及明清时期的高丽本。图书馆新旧馆舍建筑相融合，十分有特色，多样的 Little Room

的设计也很好地满足了不同学生的需求，极为人性化。

### 6 学习、思考，考察之行不说再见

相比高丽大学、首尔大学、延世大学图书馆，早前访问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在馆藏古籍的修复问题上则显得更加灵活。早稻田大学不仅设有专门的修复人才，在珍贵古籍破损严重状况时，还会外包给古籍修复工作室，指定修复方法，修复完成后再进行验收。如果是十分贵重的古籍，一般会通过竞标的方式向修复工作室招标，选择规模大、技术好、名望高的公司。对哪些部分进行修复、用什么修复技艺、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都会通过合同进行规范。

纸张、活字、修复技术、科技检测、古籍的藏与用、图书馆新与旧的融合，都在短短五天中完美呈现。科技的不断发展，也将不断影响、融入与带动传统古籍修复技术的发展，修复技术的不断进步也将更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始终保持学习的姿态，致力于古籍保护的有利环境与先进技术研究，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此行之前，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第一批专业硕士还考察了扬州古籍线装公司、浙江图书馆（全国古籍普查项目）、湖州湖笔博物馆、安徽泾县宣纸生产基地、安徽绩溪徽墨生产地、日本奈良福西手工造纸坊及高校古籍部等，与古籍保护相关的多个领域都有涉猎，对纸张、墨、古籍保存环境、古籍利用、古籍修复等有了综合全面的认识。我们都期待着，不仅能成为古籍保护与修复的“良工”，也能助力使古籍中的文字与思想活起来。

◀ 首尔大学图书馆整体风貌及修复室。应超男摄。

2017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十周年，这十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从公藏到私藏，从官方到民间，从保护到利用，都涌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进步及成果。新的十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古籍保护将如何再接再厉、再登高峰？让我们共同期待。

本期特邀专家：

沈 津：著名古籍版本学家

周德明：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李国庆：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研究馆员

全 勤：南京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 周德明： 撸起袖子，埋头苦干



2007年2月，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到2017年，已经有整整十年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上海市准备通过一个展览、一本图录、一场竞赛、一系列会议来进行回顾，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做好下一个十年的工作。”上海市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周德明告诉记者。所谓的一个展览、一本图录，即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十周年成果回顾展及“上海市古籍保护成果图录”，要把古籍保护中心各个成员馆的馆藏特色展示出来，尤其是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珍品；而一场竞赛，则是延续之前的传统，组织第四届古籍修复中青年竞赛；当然还有一系列围绕着古籍保护展开的会议。“古籍整理保护要靠一代一代人不断地努力，十年不是终点，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我们有必要做一个总结。”

在这十年里，上海市古籍保护工作特色鲜明、进展喜人。一方面，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在古籍普查及编目上传方面紧跟进度，目前，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已经完成普查工作，华东师范大学等也即将完成，全市已经做好基础整理工作。其次，根据上海市古籍保护中心、上海图书馆的特点加强古籍保护工作，比如，每年都会组织一场馆藏文献精品

联展，并配合研讨会、出版书籍等一系列活动，既做好了馆藏文献的整理保护工作，也尽到了揭示馆藏、服务大众的职责。从2007年至2016年，每年联展都有不同的主题，如2009年家谱文献展，2010年馆藏宋本展，2011年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展，2013年尺牍文献展，2016年翁氏藏书展，等等……针对这些特色主题展所出版的书籍，还多次获得了上海市、华东六省，乃至全国古籍整理方面的大奖。

围绕着古籍整理与研究，上海图书馆培养了一系列的古籍修复及整理研究人才，这些人才已经由上海走向全国，不少地方图书馆、传习所等都邀请他们授课教徒，如中山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以及重庆、湖北、辽宁等地的传习所，等等，真正推动了全国古籍保护和整理工作的进展。为了培养接班人，上海图书馆也制定了一系列人才培养计划，为年轻人提供多种学习交流的机会和研究经费，以及组织每两年一次的古籍修复中青年竞赛等，都便于他们脱颖而出。

“上海是全国古籍重镇，未来我们要发挥各系统在古籍方面的所长，进行跨系统的资源整合。比如，上海有一些科学院图书馆、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都有医学方面的古籍，我们下一个五年会联合各单位进行整理。”

## 全勤： 2017年做好“古保”六件事



新年伊始，各个单位和个人都在忙着做总结和规划，对于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来说，2017年有六件事是重中之重。其一，全力推进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完成。江苏共有156家古籍收藏单位，书目总量达20.5万册，目前已有18万条数据完成登记录入，超过全省古籍总量的三分之二，提交数据在全国名列前茅。尽管如此，古籍普查工作仍任务繁重，除完成普查工作的32家单位以及参加可移动文物普查的81家单位外，尚有43家单位还未能完成普查登记工作，其中有不少单位还没有开展此项工作。

其二，联动江苏省各市（县）级古籍保护中心，充分发挥市级古籍保护中心的区域性统筹与指导作用。江苏省古籍藏量丰富，收藏单位众多，专业人才、物力资源分布不均，在古籍保护工作中，2017年将继续推进“三方联动模式”，即由省中心在全省组织、安排，在高校招募选拔古籍保护志愿者，对志愿者进行岗位培训，由省中心专业人员带队去基层单位开展古籍普查。

其三，加大人才培养力度。2017年，江苏省将充分发挥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作用，与南京艺术学院、金陵科技学院、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合作，积极开展古籍版本鉴定、古籍编目、古籍修复、古籍数字化等不同专题、不同层次的培

训。同时，充分发挥大中专院校古籍保护专业优势，积极组织“古保”志愿者，赴全省基层古籍收藏单位，举办古籍普查登记实践培训班，帮助完成其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其四，持续推进古籍保护科研工作，力争形成重大科研项目中期研究成果。目前，江苏省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江苏经籍志”和江苏省省委重大文化工程“江苏文脉”都将逐步进入研究中期。根据工作方案，2017年将全面推进江苏省古籍书目收集整理、书志撰写、专题提要撰写等，力争形成课题研究的中期成果，为江苏文化资源的挖掘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

其五，加快古籍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工作。2017年，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要在提升硬件条件的基础上，启动重点修复项目，并以此带动人才培养和提高修复业务水平，为全省古籍修复提供龙头示范指导作用。同时，要继续加快古籍整理出版和古籍数字化进程，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的古籍资源服务。

其六，丰富古籍保护宣传方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过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活动宣传古籍，加大古籍保护宣传推广力度，提高公众古籍保护意识，推动形成全民了解古籍、阅读古籍、保护古籍的良好氛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沈津： 私人藏书家是一种前进的力量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10年来，做了很多系统性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展开，一方面在于领军人物的策划推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各省市古籍保护中心的专职人员所做的工作。特别有意义的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了解全国各地古籍收藏、保护情况，开展培训班之外，还把触角延伸到了过去有所忽视的寺庙、道观。

这十年里，还设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等古籍保护平台，例如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古籍修复基地，从研究的角度、人才培养的角度把古籍保护提升到了新高度。比如，中山大学古籍修复基地规模宏大，组织了很多系统培训，将图书馆人员、专业领域研究人员、收藏家三方面的人结合起来，对古籍保护产生推动。

从民间来看，私人藏书家作为一种前进的力量，不可低估。有些私人藏家的手中甚至有公共图书馆没有的珍本，比如上海王德，他的藏品仅六朝写经就有10多卷，很完整，都是他从日本买回来的，这就是一种回归。对私人收藏家来说，要传承中华文化，就应该让古籍回归，之后拍卖也好，

捐赠给图书馆也好，至少留在了中国。

事实上，私人收藏对古籍的保护是多方面的，比如，河北藏家赵俊杰收藏的清末民初的小本子就填补了馆藏里不受重视的空白点。

比如，香港藏家林章松收藏有2000余部印谱，比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都多，有些破损的，他还自己修复，对古籍印谱的保护做了大量工作，是图书馆人所没有做到的。他著录的材料不仅包含印谱的书名、卷数等，还包括刻印的篆刻家，即使是不知名的篆刻家，他也可以通过蛛丝马迹揭示出来，然后公开，免费分享给有需要的人。还有励双杰，专门收藏家谱，曾写过有关家谱《书眼》的文章，也从来没有人做过。他从自己的2000多种家谱当中，不断地有新发现。

私人藏书家是一种前进的力量。他们有的藏书质量比图书馆还要好。比如，王德就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收藏家，他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可以摆成盛宴；有的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对自己的藏品进行研究、挖掘，比如林章松。比起图书馆的人员被动地研究，他们的力量更了不起，所以希望有更多机会让这些藏家受到关注。

## 李国庆： 挥别2016，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中国图书馆学会有一个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来自公共和高校图书馆，他们是当代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代表，所从事的古籍研究工作也具有代表性，我们仅以2016年为例，晒晒他们的成绩单。

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研究馆员，取得多项古籍整理出版成果，包括：《金石学稿抄本集成二编》（27种）、《中国古代书目题跋丛刊》（10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方志部》、《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目录》校订、《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日记汇刊》（30种）、《日本藏中国古籍综录》等。用力之深，成果之多，份量之重，超乎想像。

南京图书馆徐忆农研究馆员，一年中夜以继日，从事自己喜爱的古籍研究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甚多，发表《东亚彩印版画的传播与影响》等4篇研究论文；参加《中华珍贵典籍史话丛书》编纂与审核书稿等5个研究项目；尤其是主持海峡两岸第三届玄览论坛，在海峡两岸产生积极影响。

武汉大学刘家真教授，是古籍保护领域重量级专家，撰写一部古籍保护研究专著《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国家图书馆苏品红研究馆员，承担完成了《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圆明园

卷初编）。国家图书馆王红蕾研究馆员，多年从事寺院藏书研究，2016年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灵隐书藏与寺院藏书》，在《古籍保护研究》第二辑发表。云南图书馆王永乔研究馆员，2016年主编《云南护国运动史料汇编》和《云南抗战文献史料选编》两套历史文献丛书。中国科学院罗琳研究馆员，在主编完成了皇皇巨制《四库提要著录丛书》之后，撰写了《四库提要著录丛书》编纂札记系列文章。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聘研究馆员沈乃文，撰写了《赵万里先生之版本学》等3篇论文。上海图书馆黄显功研究馆员主编《合众图书馆丛书》7卷。河南大学图书馆李景文研究馆员主编完成《民国教育史料丛刊总目提要》一书。天津图书馆李国庆研究馆员主编两部古籍文献丛书：《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天津地区图书馆编印旧版书目汇刊》。

这几位委员取得的成果，是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可谓厚积薄发。我想，作为一名年轻的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倘若怀有投身于古籍事业之志，倾注足够多的热情，在平凡的日常工作中，又善于发现、善于积累，善于总结，那么在不知不觉中，业务工作就会有质的飞跃。



桐城文章·天下传

FANGZONGCHENGJIJIANTOU

方宗诚九间楼

他一生致力于编辑桐城派作者的文章，使得散落在各处难以查得的妙文汇集在一起；且有藏书之好，修建“九间楼”，藏书上万册，这个人就是桐城派的后人方宗诚。

### 书声朗朗“泣贼人”

方宗诚的父亲方松也是位读书人，虽然家里贫穷，白天需要出去劳作，但他仍坚持夜夜读书，最喜欢读的书是《太上感应篇》和陈宏谋的《训俗遗规》。那时候，灯光昏暗，方松到了中年，眼睛就不行了，但他仍然好学上进，就让儿子方宗诚给自己读书。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方宗诚对文章极有兴趣。方松觉得自己这个儿子很可能有大出息，于是就咬牙凑钱给他请了位师傅，这位师傅就是许鼎（字子秀，号玉峰，晚年更名鲁，清代桐城人，工诗善书，能文章，著《正志》《正学》二录），他的很多话对方宗诚的成长影响较大。

咸丰年间，太平军多次攻打桐城，方宗诚便在鲁硃山建起了避难所，将其起名为“柏堂”。他在柏堂继续读书，可能是为了有经济收入，也在这里教学，方宗诚说，“余避乱之室名柏堂，为诸贤聚晤之所”“避乱以后，颠沛流离，几穷经学古不懈，每夜必至三鼓。暑热即偕诸友诸弟坐卧竹榻上，或水石之间，背诵经书古文，声朗朗彻山谷”。在这种危险困难的境地，竟然坐在大山之中背诵经书和古文，这集体背诵的声音响彻在山谷里，难道不怕被太平军抓住？方宗诚说，这些贼人们确实听到了：“咸丰甲寅冬，贼牧庵孝廉之败于桐也，存庄窜至余家，时夜漏数十下，贼烽四逼入谷口，闻儿读书声，叹泣曰：此天人也！”

这些贼人们听到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竟然感动地哭了。想想这一幕，真有画面感，这才叫真正的惊天泣鬼神，噢，不应当称作“鬼神”，应当改为“泣贼人”。

### 直达天廷《俟命录》

方宗诚躲在大山里也不是天天教孩子们朗诵诗文，他也在写自己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就是《俟命录》。此书堪称方宗诚的代表作，研究了天、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动乱的原因，其中心思想，按照方宗诚自己的说法则是：

“大难之兴，虽曰玉石俱焚，然以余历观古今，真能为天地任参赞之责者，断不在劫数也。惟忠义之士，致身效事，然此乃支撑纲常、扶持正气，不得谓遭劫。若夫有学有守，有猷有为，出可以安社稷，处可以传斯道者，此

# 桐城文章得传，九间书楼仍在

□北京 韦力

天心所赖以常存，人道所赖以不息者也。自能历劫不磨，人可不勉哉！”

山东布政使吴竹如看到这部《俟命录》，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就推荐给了大学士倭仁；倭仁也觉得这部书思想正确，于是就摘录了部分内容讲给皇帝听，这使得方宗诚的名声直达天廷，京城的学人都知道了有方宗诚这么一位人物。到了同治元年，方宗诚成了河南巡抚严树森的幕僚，替严树森写奏折。再后来，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于是推荐方宗诚当上了枣强县县令。曾国藩为什么要推荐方宗诚呢？还是因为《俟命录》，书中有不少的地方都提到了曾国藩领导的湘军跟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据说，方宗诚是位清官，卸任回家时，当地老百姓赠送的礼品他一概不收，只让属下挑着四大担自己的藏书回到了家乡。然而回家之后，他的儿子方守彝帮他整理运回来的藏书，却发现这些书里面夹着许多金片和银片，儿子马上问父亲是怎么回事，方宗诚支吾一番说不出话来，儿子就看着这些金银片落了泪。方宗诚只好告诉他，这都是自己的下属还有好朋友送的礼品，他不要，但是朋友们一再劝他拿点钱回家去作生活用，并且他还有很多著作没有刊刻，也想用这个钱作为刻书之资。据说方守彝听到父亲解释之后，义正辞严地跟父亲说，不能这样做，用受贿来的钱印自己的道德文章，这会让书中的光辉思想受到污染，还说应该把这些钱送回枣强县，在当地捐助助学。方宗诚听到了儿子的话后，特别感动，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儿子值得骄傲。

### 藏书万册“九间楼”

方宗诚回到桐城之后，就在勺园建起了自己的藏书楼，楼名叫“九间楼”。藏书楼建得不小，可惜没有《藏书目》留下来。据说勺园曾是“张宰相家的西宾之所”，后来桐城派的祖师之一刘大槐也在这里讲过学。可能是这个原因，方宗诚极为看重勺园，在此藏书、讲学、著述。九间楼的藏书量我仅查到了这么一句话：“传九间楼藏书上万册。”

方宗诚在勺园中写了不少的书，但桐城派作品的集大成者——《桐城文录》，却早在勺园修建之前就开始编辑。咸丰二年，他跟戴均衡开始收集资料，后来太平军打到了桐城，当地的很多藏书都被焚，戴均衡也死在了外地，使得《桐城文录》的编辑被迫中止；后来方宗诚在鲁硃山避难之时仍然在编此书；再后来，他在朋友方宗屏和弟子萧穆的帮助下，终于编完了这76卷本的《桐城文录》。此书收录了83位桐城派作家的作品，后来他的弟子萧穆又在此基础上继续搜集，用了30年时间编成了264卷本的《国朝桐城文征约选》。因此，方宗诚对桐城派在文章的编辑方面做出了挺大的贡献。



岁月静好“勺园”居

由桐城中学步行至勺园约十几分钟，勺园在小街左手边，园门口上面有“勺园”二字，旁边墙壁上镶有文物标牌“方氏九间楼”。勺园大门虚掩，由门缝中可以看见里面是个小菜园，小菜园后面为一栋老房子，两个孩子在圆形门口玩耍。大着胆子推门而入，园中种着几种不同的蔬菜，还有一块巨石和假山，角落里有一口古井，两个孩子在月洞门口跳来跳去。月洞门后是一个极小的天井，然后是一个前后无门无窗的过厅，过厅两边皆是旧时木板，木板墙上分别贴有崭新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靠墙而放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时沙发及八仙桌等物，一切皆流露出旧时岁月的味道。厅后又是一天井，天井处屋檐下有几块大石，看得出是旧时厅堂内立柱下的基石，有些尚有花纹。两个男子坐在屋檐下聊天，据说里面住的都是方家后人。不一会儿，里面出来一位60岁左右的阿姨，我向她问好，说明来意，



废置已久的“方氏九间楼”。

称特意来访藏书楼，她其和善地说：“就在上面，以前就是藏书楼，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上去看看吧。”

楼梯极窄极陡，仅容一人上下，而且几乎是立着的，又堆满杂物，灰尘扑面，显示废置已久，光线亦极暗，仅由木板间漏些光线进来。楼梯上面是阁楼，左边小间里堆着一些不知何物的杂物，右边比较开阔的阁楼里较为空旷，正中一个木厢，脚下则是条状木板。略走两步，听得下面阿姨大声说：“你小心一些啊。”忽然意识到下面是人家的正房，也许是卧室也未知，如此行动，楼下必然灰尘扑落，故不敢行走，拍下几张照片就下来了。阿姨说当年这里就叫勺园，一排房子共有九间，故称九间楼。她还说：“现在政府已经保护起来了，但修理什么的还是自己掏钱，比如尚在的瓦呀，保护就是不让拆的意思。”

说话间，一个年轻姑娘走了过来，我又向她询问方宗诚与方东树可是一脉？她告诉我，方东树与方宗诚是一族的，但与方苞又不是一族：“桐城有三个方，三个方是不相关的，分别是鲁硃方，就是我们这一支，又叫猎户方，因为这一支在山里，以前是打猎的。方苞他们是桂林方，还有一个叫会官方。我们这一支还有一个作家在北京，前几年刚刚去世，叫舒芜。”那位小姑娘提到的“舒芜”本是方管的笔名。方宗诚应该算是方管的曾祖父，而马其昶则是方管的外祖父，马其昶的女儿就是方管的母亲，可见方管的的确是桐城派的正传。对于勺园，方管曾有这样的说法：

“勺园今已无知者，也是当然。今人只知九间楼、凌寒亭、方东树家庙，其实那都是勺园的一部分。因为大门没有了，一部分又成为荣军学校的房屋，所以‘化整为零’了。归化厅尚完整。勺园即在其南。”

离开时，走出月洞门，看见门口的小菜园以及刚才进来时的小院门、两扇木板后的门栓，一切如此亲切静谧，能够保留到现在，真好！